

【山师学人之一】

□刘增人

写下这个标题,心里却犹疑起来。因为我1959年考进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时,田仲济先生已经是副院长。四年里,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一节课,也从未作过一次学术报告。尽管久闻大名,却难有一面之缘。

第一次见到田老,是1964年暑假。1963年我从山东师院中文系毕业,与高照福、张肇勋、李长芹三位师兄一起分配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任教。这学校后来曾先后改名为泰安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泰安师专等,现在叫做泰山学院。我

我的老师田仲济先生

因为那是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那次我可是物质与精神双丰收,居然无意中见识了那么大的学者平易亲切的风采。

们四人,都安排到函授部,除长芹兄后因故回到故乡外,都教古代文学,住在同一间教研室,每人占据一个角落,一张木板床,一张三抽屉桌。一年内,我从《诗经》的《七月》教到《牡丹亭》、《红楼梦》——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路径,总算大体摸索清楚了。不料第二学期末,函授部领导安排我改教现代文学。那时,除去服兄,绝对没有其他人选择。但我还是找到1963年从山东师院中文系调到泰安担任中文科主任的书新先生“诉苦”求教。他听完我说的一大堆困难后,笑咪咪地说:“我带你去找真正的老师。”于是,我跟从书新先生回到山师造访田仲济先生。田老慢条斯理地告诉我不要着急,学问不是一天两天学到的,先把《鲁迅全集》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后来我也带研究生了。第一堂课也总是要求他们细读这两部书)通读一遍,再有时间不妨选择几种书新先生从上海买回的旧期刊,例如《前哨》、《拓荒者》、《文学》等仔细看看……谈话时间不长,田老便说带我们出去吃饭。我懵懵懂懂跟着两位前辈,东拐西绕,竟然走进了纬四路的“燕喜堂”。我虽然在济南呆过四年,但从来没有想过与“燕喜堂”有任何关联的事物,更不要说走进去吃饭。坐下来后,田老才说:“今天请你们吃烤鸭。”什么是烤鸭?怎么吃法?对于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课题”。田老不嫌弃我这“贫下中教”土得掉渣,没有见过世面,居然亲自用面饼卷起鸡肉,包上大葱、面酱,教我一卷卷“吃烤鸭”。因为那是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那次我可是物质与精神双丰收,居然无意中见识了

那么大的学者平易亲切的风采。

1978年,田老开始招收研究生了,我写信去问我能否报考,特别想实现自己真抽屉桌。正当一回田老的学生们的夙愿。田老说,来联系的人很多,你不但要认真准备专业课,更需要外语过关,后者尤其重要。得到首肯后,我立马兴冲冲地到校长办公室请求给报名申请书加盖公章。不料掌控公章的秘书说:领导有规定,讲师及以上职称的人离校,必须有主要领导签字才可以加盖。我于是挨个找书记、找校长,充分体会到什么是推诿扯皮,什么是圆滑世故。大概是找得他们过于厌烦了,就让我听通知,说党委联席会研究后再说。十多天后,秘书先生通知我:你可以报名了,不过报名时间已经过去一周多,明年再说吧……我的满腹怨气让书新先生知道了,也就让田老知道了。他托人捎信说:人总要换位思考。哪家学校不想留住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这样的老师纷纷离去,学校怎么能办好?而且,读研自然是提高水平的好机会,但绝非唯一的途径。在教

学中发现课题,通过研究指导教学,科研与教学互相促进,应该是大多学者的成功之道……

1980年冬天,我要去青岛查阅关于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的研究资料,但听说旧中国的报纸,青岛都作为“敌伪档案”收藏在青岛档案馆,非持有省级以上的介绍信才允许查阅。我所在的学校,是县处级单位,所在的地区,也不过是个厅局级单位。无奈之下,只好求助田老。他没有迟疑,马上给时任青岛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朋友亲笔写信,青岛的丁部长又给我开具了青岛市委宣传

部的介绍信,还特地给档案局的领导打电话希望安排我前往查阅。那次造访,所获甚丰,只是青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基本没有收藏,即使有也不过每年两三张散页,田老在这里创办的几个副刊的情况,终于没有着落。心中的怅惘,久久无法释怀。

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海南召开年会。在椰子树婆婆的树影下,我见到了田老,他继续关注着我的王统照研究的进程;见到了樊骏先生,他鼓励我把王统照研究这一颇为寂寞的工作坚持下去;见到了代表贾植芳先生向田老问好的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知道了我们这个学科还有这样的青年才俊……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2012年1月14日,田老病逝于济南千佛山医院,享年95岁。1月20日,遵照田老遗愿,亲属和学生来到青岛海边,将田老和师母预留的骨灰一同海葬。那天正是旧历的“腊八”,码头上浓云密布,阴风低吼,天气和人们的心情一样阴沉。不料船行至一号海域,即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却突然云开风停,一抹灿烂的云霞缓缓地装扮着海空。只见船尾处鸥鸟翔集,白浪翻卷,田老夫妇的骨灰,伴随着鲜花,徐徐撒入碧绿的海水。这里是田老文学生涯的起点,也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创作与研究并重,著述和育人齐驱,田老可谓生荣死哀,功德圆满矣!

高天厚土,海阔风轻,愿在你们宽厚的怀抱里,妥安这一伟岸的灵魂!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大唐三藏圣教序》简称《圣教序》,其中的“圣教”,指的就是《西游记》中的唐玄奘从印度取回的佛教经典。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唐僧并不是唐太宗李世民公派出国的,而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偷渡去印度的。但他经过十七年(628年-645年)的努力,不但在印度的佛学辩论中力挫群雄,而且取回了657部佛经,亦即圣教。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安排他住在长安(西安)弘福寺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八月李世民亲自为这些译经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圣教序》的来历。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西院筑五层塔(即今之大雁塔)贮藏经像。

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的《圣教序》,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书写的。目前较著名的《圣教

【碑刻漫话】

唐僧取经与《圣教序》碑

□杨加深

序》碑刻有两处:最早由“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的称《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后来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的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褚遂良书写的《圣教序》楷书碑,唐永徽四年(653年)立石。因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故又名《雁塔圣教序》。与“圣教”相关的褚书石刻,还有一块,是唐高宗李治撰文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书法地位,当时褚遂良书写御撰《圣教序》,都是毫无争议的二不人选。

时隔19年之后,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内府所藏的王羲之书法中集成的另一部《圣教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问世了,这项历时长达二十四年(648年-672年)的大工程,由京城法侣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佛字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立石于西安弘福寺,后移至西安碑林,现藏西安博物馆。

集字固然不是出自集字者亲笔,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其难度要远远超过亲笔书写。因为集字首先要搜集到所需的全部字库,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经过长达二十四年的努力,通过内府查找、各地搜集、全国征集等多种途径完成的《圣教序》所需王羲之字库,其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集字还要考虑所选字风格的大致统一、上下字之间笔法的连贯,同一个字重复出现时,还要考虑避免字形的重复与雷同,同时兼顾与相邻字的大小、斜正、疏密、动静等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当无法直接找到所需要的原字时,还需集字者从其他的多个原字中选择合适的偏旁部首,或放大,或缩小,或变宽,或变窄,或调整角度,或重新搭配,等等;若仍无法满足需要,甚至还有用少量草书代替的。集字的章法也要尽量借鉴王羲之的典型模式,同样的字,如果排列形式稍有区别,在视觉效果上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尽管只有2400余字的《圣教序》,却花去了怀仁和尚整整二十四年的时间。

与褚遂良版的《圣教序》相比,《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意义更大。原因如下:

1.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无论在时代还是书法水平及影响上,都无疑是高于褚遂良的。尤其在唐太宗眼里,王羲之是“尽善尽美”的,怀仁用圣王羲之的字来匹配唐太宗的撰文,无论是出于艺术的考虑也罢,还是有取悦唐太宗的目的也罢,都堪称聪明之举。

2.在后世王羲之真迹片纸无存的情况下,《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为王羲之书法的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在褚遂良的楷书《圣教序》之外,借书圣之手,为时人和后人展现了《圣教序》的另一种书写面目。

3.《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在字数上是王羲之《兰亭序》的十倍以上,这无疑为后人学习王羲之书法提供了更大的资料库。而且,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看来,我们也可以排除《兰亭序》为唐人书写的错误说法,可见该碑刻的价值之大。

当然,《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毕竟不是王羲之一气写成的,章法布局上也与王羲之其他作品有差异,尤其是个别字势连贯不够、行气不足等,但瑕不掩瑜,这些不可避免的遗憾,我们可以通过参考王羲之的《兰亭序》、《丧乱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二谢帖》等细加体会,从而通过长期的临摹与感悟,逐渐学得王羲之书法的真谛。

如果说唐僧是在行程万里、历时十七年后终于取得正果的话,那么,怀仁和尚一直浸泡并取舍于王羲之的书法之间,其二十四年间专心于斯的寂寞与执着,至少在我看来是丝毫不亚于唐玄奘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学术观察】

□谢泳

中国学界现在普遍流行的论文格式是西式的,以专业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为主要代表,据说此类文章基本没有真实阅读量,而只有升职统计量,当然这个判断可能只代表部分人情绪化的态度。

西式论文的格式是先陈述所谓学术史,再表达创新处,强调处处有注解、句句有来历,得意处是注释比正文长才专业。西式论文格式,对一般社会科学研究可能有较高合理性,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但对中国文史研究,我以为基本不合适。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它合适,为什么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钱锺书他们早年不提倡这个东西?我们难道比陈、胡、钱高明?陈、胡、钱一生文体,都是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格式。我近年观察,此类西式论文的流行,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史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害了中国的文史研究,现在很多学中国文史的研究生,不会写文章,写不了像样的文章,可能与这个训练不无关

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

学术的自信源于对学术的忠诚,好的中国文史研究,似乎没有必要削足适履,硬往西式论文格式上靠。

系。

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式,文体多样,掌故、笔记、诗话、札记、批注等,核心都在有新材料和真见识,讲究的是文章做法,不在字数多寡,但要言之有物,要有感而发,所以学术研究中饱作者个人才情。好的中国文史研究,不拿架子,不装腔作势,凡陈语腐言,一概摒弃。

西式论文成为学界主流,大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在提倡学术规范中引进的,后来大学评价体系完善后,西式论文就成了学术主流,不按这个规则写出的文章即不合法,不成为学术文章,流风所及,今天西式论文已是独步天下,所有学术期刊都统一到了一个格式上。

文体变革直接关乎思想表达和文化遗产。陈寅恪当年对佛经在中土流传中的文体变化极为敏感,他专门注意过佛经“合本子注”的演变,很早就察觉到了文体在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文《论韩愈》中总结韩愈的贡献,有一项就是文体。陈

寅恪说:“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借之一扫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以文为诗,尤为独创。较之华译佛偈,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

陈寅恪自己的文体就是传统中国文史研究格式融合西方学术研究精神后形成的,比如在学术研究中何谓独创与何谓别人已有学术观点和史料,陈寅恪叙事中极为明晰,自己的发明绝不轻易让渡,而对别人的创新研究时表示敬意,哪怕是偶然意外重复,陈寅恪都要特别加以说明。但陈寅恪的文体是中国的,形式上没有一点洋气,钱锺书更是如此,他的文体一直走中国传统诗话的路子。但陈、钱的文体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

中国文史研究的文体问题相当重要,它本身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漫长的文明

演进过程中,在文体和思维方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考证、义理、辞章的完美结合,始终是学术大家的共同特点。而西式论文成为学术体制评价主流后,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特点基本就消失了。我们今天很难在正统主流学术期刊上看到考证、义理、辞章统一的好文章,所见多是大而无当,空话连篇,以粘贴史料、转述各方观点为主要叙事模式的高头讲章。

学术的自信源于对学术的忠诚,好的中国文史研究,似乎没有必要削足适履,硬往西式论文格式上靠。我以为理想的对中国文史研究应当满足如下三个条件:一、汉语写作;二、中式文体;三、个人情感。

西式论文主导学界是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带来的一个恶果,它适应于升职称、拿课题和套经费的量化管理,现在应该是反省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